

INDIAN
PHILOSOPHY

闻中
著

CHINESE
PHILOSOPHY



中印哲学精神
之会通

上海人民出版社

INDIAN
PHILOSOPHY

梵学与道学

中印哲学精神
之会通

CHINESE
PHILOSOPHY

闻中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梵学与道学:中印哲学精神之会通/闻中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345-5

I. ①梵… II. ①闻… III. ①哲学-对比研究-中国、
印度 IV. ①B2②B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2898 号

责任编辑 耶 冲 张钰翰

封面设计 陈 韵

梵学与道学

——中印哲学精神之会通

闻 中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23,000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345-5/B·1354
定 价 78.00 元



序

孙智燊

读《奥义书》是我生之慰藉,也将是我死之慰藉!……它是人类智慧的巅峰。——阿瑟·叔本华

Reading *The Upanishads* has been the solace of my life, and it will be the solace of my death. It is the highest of human wisdom.——Arthur Schopenhauer

印度哲人之玄妙精微使大多数欧洲的大哲学家看起来都跟小学生一般。——T.S.艾略特

Their subtleties make most of the great european philosophers look like schoolboys.——T.S.Eliot

一、从一段论学因缘说起:“不打不相识”

闻中先生要我为他这部新著论文集《梵学与道学》写篇短序。对我而言,是既深感惶愧,又倍觉殊荣。二者基于同一理由:因为我不是印度哲学与宗教方面的专家学者,虽然我献身比较哲学研究已有逾半世纪的学龄。唯其因为本身并非这方面的专家,故深感惶愧;唯其因为深感惶愧,故倍觉殊荣。我只是以一介老学(习)者、慕道者、兼对著者的钦佩者之三重身份,而愧领这份殊荣的。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叹道:“予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我想今天本书的大多读者也会大有同感吧。所以,请先谈谈闻中其人,再及其书。人的品位特色决定书的品位特色。先说说我是怎样和闻中“相识”的。

就一般意义而言,我们之间,既无人介绍,也从未晤面。读者也许诧异,既然如此,怎敢说是“相识”呢?然而,人有天天见面,却未必真正相识者;相反地,也有彼此从未晤面,却能经由其他方式而莫逆于心者。庄子不是说吗?“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而未尝不言”,我们也同样可说:“终身见,未尝见;终身不

见,而未尝不见”。不然的话,后人还能神交古人,前贤还能启迪后昆吗?前者情形,如史迁之于孔子;后者情形,如古圣之于后生。我与著者虽同代而生,却云天万里,晤面缘悭。但不碍彼此相知,一切得拜谢当代通讯科技发达之便。据闻中透露,他保存了近五年来我们之间的纯论学书简不下八百余封(近千)!

但若就某种不可思议、难以言说、但确属某种特殊胜义而言,“介绍”我们相知相识的人和物,因素固然很多,来头更是不小。总结地说,就是印度贤哲所常强调的那个“缘”字,也正印证了中印哲学中“因缘和合而成”的义谛。大举言之,这位“缘”先生、“缘”女士、“缘”大师的构成元素,就人因而言,至少包括中印三位大学者——方东美、斯瓦米·尼奇拉南达、斯瓦米·洛克斯瓦南达(Master Thomé H. Fang, Swami Nikhilananda, and Swami Lokeshwarananda);就物因(其实在人)而言,至少包括中印两部大书——《尚书》与《奥义书》及其共同一点精义。

此外,若再就客观世界有利论学的环境而言,就是当前高度发达的资讯科技。人类之间,遥隔万里;意念交流,弹指即达。

基于上述三点理由,我才敢不揣冒昧,向广大的汉语读者群宣称:我对著者其人不是略知一二,而是相知有素;并愿掬诚推荐,如实美赞他这位难得的杰出青年学人,作为本书的简序。

缘起:一切只为了一小段《奥义书》的中译。说句笑话,我们是“不打不相识”的!中国大哲方东美先生在其巨著《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里,关于古代中国民族原有深厚的宗教情绪一节,借引《伊萨奥义书》的《祷词》(又称《平安颂》)以说明之:

……上天之神圣性自永为人所尊崇,而敬事弗违;然而人又何尝不曾内秉尊严之神性?故精神上,人性实与神性彼此一脉贯通、契合无间。《尚书》至谓“天天工人其代之”!中国此种宗教情境,可借印度《奥义书》祷神祈灵之言以形容之曰:“奥姆!此也一充满,彼也一充满。此一充满,原来自彼一充满。此一充满,复融入彼一充满。当此时也,其余一切,俱是充满、充满充满。”

大约五年前(2013年)吧,我忽然接到一位笔名“闻中”的新浪网友投书,表示拙译引文不无商榷余地。询者立场认真坚定,但语气婉转有礼,态度谦和诚恳。展读之余,我的自然反应呢?初则皱眉,既而一惊。使我皱眉的是,“何方少年,竟敢挑战学术权威,如方东美大师与尼奇拉南达大师者”?使我一惊的

是,兹事体大,是否区区的中译本身有误?果而如此,岂不真如台语所谓,成了个“代志既掉”(大事一条)!细按方大师原著英语文本,该句祷词,尼奇拉南达大师从印度圣哲商羯罗诠释,英译读作:

Om. That is full; this is full. This fullness has been projected from that fullness. When this fullness merges in that fullness, all that remains is fullness.

我反复斟酌,自忖拙译大体无误,末尾为了助强语气,顺势捻加两个“充满”,也与大旨无悖。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经过反复通讯,坦率切磋,问题终于明朗。原来方大师所根据的是尼奇拉南达的译注本,出版于1940年;评者闻中的质问则是依据斯瓦米·洛克斯瓦南达的新译注本,出版于1990年之后,两者时差约半世纪之久!方著撰作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对洛译新本《奥义四书》自是无从得晓;而区区忝为方著之中译者,仅职在忠实传译原著及所引文本,他非所计。这一点,承蒙闻中同情理解,未予苛责。不久他的新译《印度生死书——四部奥义书义疏》寄到,原来这段同一《祷词》他译作:

唵。彼梵是无限的,此现象界亦是无限的,但“此”仅仅是“彼”的投影。

〔然而,〕若“此”消失,“彼”仍与原来一样,仍是无限的。^①

读者试请比较一下,两种译文有何出入?旧本但言“彼此”,新本则详明“彼此”之所指——“此”指现象界,“彼”指“大梵本身”。旧本“充满”,新本则作“无限”。旧本“来自”,新本则作“投影”。旧本“融入”,新本则作“消失”,注为“消融”(出入不大)。

假如方大师今天在世,我极愿意向他老人家推荐闻中先生所采用的新本英译《奥义书》,供其考虑。

二、作者其人:新四真子——真学者、真君子、真诗人、真宗教践行者

无论如何,经此一番坦率交流,使我发现闻中这位青年学者有许多难能可贵的优点。我之颇能有鉴于此,实得力于业师东美先生之教:一是作为一个学者,要有“服人之善”的精神,而从善服理。——语见他《与熊子贞先生论佛学书》^②;

^① 参看闻中:《印度生死书——四部奥义书义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页。

^② 参看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第668页。

二是“老师错了,就直说错了。这没有什么不对,是不必曲意回护的。”——语见他评论朱子高弟陈淳。^①今天,尤其第二点,试问国内外稍具学界声望的所谓大师者流,几人能做到?

正是在此等良师开明之教的启迪下,使我得以发现评者闻中的许多内在美德,例如:

作为一位学者,他有大胆怀疑、不迷信崇拜权威的美德,本此美德他才有论学认真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毅力。过去我就称赞过他治学有“道生精神”——四依四不依:“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

更难得的是,他论学立场坚定,但却态度谦诚,敦厚有礼。他这种君子论学之风也许和他一度留英的背景有关。我大学时的导师曾约农教授,曾提示我们一篇高明的文学批评,说它对当时英国文坛某派文风有极犀利而中肯的批评,但行文措辞典雅大方,毫无烟火气,更无火药味,尤不带脏字儿,而鼓励我们要多多学习“How to argue gentlemanly”(如何论学而不失君子风度)。

此外,他还有种诗人的气质与禀赋。这是我读到他新译的《印度生死书》之后才印象较深的。这方面他有位前辈徐梵澄先生。徐先生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一位奇才和怪杰。他的怪表现在与乃师鲁迅通讯时坚持写文言,不写白话,用繁体,不用简体,作直行,不作横行。但他依然深受鲁迅赏识,战前得其帮助、鼓励而留德,并加强德文,以深入译介更多的尼采著作。他的英文本有基础,留德三年,又兼修德文、拉丁文和希腊文;但因奔父丧而回国,未能完成学位。1945年以后,至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又名和平大学)之任教,后又就职于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至1978年底回国。其间他尊礼印度圣哲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为师,深造梵文,除翻译乃师大作《神圣人生论》两卷外,致力精译《五十奥义书》,几达一半。他坚持使用文言古诗体裁,结果和前辈吴经熊先生以古体翻《旧约圣咏》、以文言译《圣经新约》的命运同科。不出意料,“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言之太文,行之不远”!闻中有鉴于此,独辟蹊径,以简洁清新的白话新诗为载体,重新翻译四本《奥义书》。其尤难能可贵者,是他以一个宗教人格实践者的身份而从事此事,故字字从心坎本源流出,句句从生命亲验翻出。

^① 参看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第134页。

宗教性格是闻中人格的核心本色,乃其实;学者、君子、诗人则只是其枝叶花果,乃其华。请证以下列事实:其平素治学,谨严精进,不数年间,持续发表有关印度哲学论著佳作多部,从《梵·吠檀多·瑜伽》,而《印度生死书》、《原人四足与玄之又玄》、《实在与羯磨——默观与行动》、《千岛语录》、《〈印度文明大系〉序》等,如本书收载,都二十篇。尤可贵者,其心路历程不徒形诸文字,更见诸践履实行。除访学英伦外,且曾深入印度本土,参礼梵教多位高僧大德,去岁且穷半年之力,不辞艰苦,攀登喜马拉雅山岭群峰,寻师问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乃获赠《印度文明大系》百科全书影印本在华之发行版权。此外,复携返经典七百来部,都五千馀卷!玄奘游印十七年,白马驮经,运回中土,仅《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译成经文,计一千三百三十卷,且内容仅限佛教经典。闻兮!中兮!志宏愿伟,务使印度梵慧广闻中土,中土道心通达印度。得道多助,假以时日,无上功德,不让佛教玄奘大师专美于前!

基于上列观察,作为一位哲学美学学者兼教师,闻中堪称集学者、君子、诗人、宗教践行者四美于一身,为朋辈中罕睹。故我尝以“新四真子”赞之曰:真学者、真君子、真诗人、真宗教践行者。自忖所状如如,字字落实,绝非溢美阿赞。同时对此多重综合人格类型之难能可贵处,我更可借引方东美大师之名言,以实所见:“健全的哲学精神,优美的诗歌艺术与高尚的宗教情操,三者互激交融”,人生方得圆满。^①

对一般哲学家缺乏宗教体认而侈谈宗教者(如胡适者流),方大师更有句警世名言:“真正的哲学家,如果不同时具备宗教家的身份,则他只以哲学家的身份去谈宗教,一定是外行!”^②

三、作者其书:一部宏伟计划的优美序曲

本书收集著者近期佳作二十篇,篇篇自成系统,而又整体呼应。它拢结了其前此——至少十年之间——从事探索印度生命哲学与宗教的心路历程及心得结晶,从而拓展并提升了他迈向未来更深邃、更恢弘、更远大、更崇高的生命目的:重建一座沟通中印这两大东方文明古国之间的文化桥梁。至少,他是一直在为

^① 参看方东美在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的主题致辞《诗与生命》,收入《生生之德:哲学论文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2005年,第479页。

^② 参看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第122页。

此宏大工程谱蓝图、扎根基，而敬业从事，呼召同情的。他的努力可形容为一部纯由愿力与识力谱成的优美序曲二重奏。

1923年，伟大的印度诗哲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访华，他很明白此行的目的和使命，宣称“要连接中断千年的中印文化及精神交流”。由于种种历史的因素，泰翁访华快一世纪过去了，他所期待的中印文化交流迄未见有何长足进展。直到今天，我们在闻中的身上才喜见其为此宏伟的目标踵事增华，摒除万难，迈出的一大步。

说来令人扼腕浩叹，中国自从汉末以来与印度——天竺——接触不断，但绝大多数是佛教的输入，隋唐之际真谛法师传译大量唯识经典，其中杂有部分《胜论》文献，数量有限。总的来说，佛梵输入，量上不成比例。尤不幸者，宋以后中国寺院梵文传承几告终断，致千百年来国内梵文人才奇缺。试问对研究华梵语文，词典类书多么重要？唐代所辑《翻译名义集》，内容仅载汉语译音与释义，梵文或巴里文原典竟悉付阙如！观此环节，便知问题多么严重而荒谬！至其症结所在，方大师一语道破：“中国天才民族的可恶！”这方面他老人家的一声棒喝，正值得今天一切重新出发、认真从事沟通中印道梵桥梁的精神同道、济济多士参考。兹将方大师的《天才可恶论》原文征引如下：

佛教的经典经过翻译成为中国文字之后，我们发现很多新的问题。关于这些新的问题，我们看，世界上所谓的天才民族固然值得我们欣赏，同时也有它可恶的一面。既为天才而又可恶，怎么说呢？譬如像中国人，在后汉到隋唐时代的六七个世纪，把最好的心力都贡献在佛学研究上面；但是中国人太骄傲了，他把佛学的经典翻成中文以后，竟然没有留下一套完整的讲梵文的书；梵文的文法也没有，梵文的字典也没有，只是在唐代还遗留下《翻译名义集》。但是《翻译名义集》是用中文写的，这在学术界上面可以说是一大荒唐事体。这荒唐的事体就是天才的可恶。天才的民族太骄傲，它觉得外来的思想已经被整个翻译成我们中国的文字，而中国文〔字〕是最完满的文字，所以原来所根据的梵文可以扔掉了。

这就是我所谓的天才民族太自大、太骄傲的地方，结果在文化的保留上面，有时产生新的障碍。从后汉、六朝到隋唐时代的六七百年之间，我们的民族天才把苦功都花在梵文研究上面，假使他们把这个文字的结构，从文法、语法到辞汇都保留下来，那么我们就可以仿佛近代英国人、法国人、德国

人在讲希腊思想时,可以诉之于希腊的文字。这样多么方便!所以,有的时候民族太自信了,反而在从事文化工作上面会产生弊端。^①

泰翁所憾,中印华梵文化交流中断千年,固然言之有本,绝非虚语。但从历史上衡之,佛教东来,初始于汉末,酝酿于魏晋,大盛于隋唐,渐衰于两宋,亦历时千年,其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但聆佛说,不闻梵教。整体而言,我们对作为东亚近邻的古印度文明及其真正主流思想的代表杰作,从《吠陀诗》到《奥义书》,惭愧!可说是“一隔两千年”!泰翁所说的“中断千年”云云,恐怕还是礼貌客气的“外交辞令”。

四、哲人五美——才、学、识、德、愿

清儒章学诚提倡史家三德“才、学、识”,区区拟再添加二目,合成五美:“才、学、识、德、愿”。我认为这五美不但应为良史所必备,而且应该为一切优良学者译者所必备,缺一不可。

以此衡准,评估闻中,融通道梵,搭桥中印,堪称任重道远,深庆得人。例如:2014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与中华书局为纪念方东美先生诞辰115周年,联合举办“方东美哲学思想研讨会”;海内外与会学者一二百人,发表论文二十篇,涉及方先生与印度哲学及文化者,仅闻中一篇而已——即《实在与羯磨——试论方东美之哲学智慧架构中的第四慧》!^②该文甫出,即深获现服务国家宗教事务局、出身北大的颜玉科博士高度嘉许。何以闻中能够独具只眼,宁略人之所详,而详人之所略呢?无它,识也。他是以学养识,以识御学。故能学识双彰,才德并美。

识之义,深矣哉!愿之力,大矣哉!

关于成就一位伟大艺术家的基本功,尼采提示三字诀——“高、深、僻”：“从高处搜奇,从深处探胜,从僻处创新”,^③而关键在“识”。识力不足,何从简择?

^① 参看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第178页;又2005年版,上册,第230页。

^② 参看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及中华书局合编:《纪念方东美先生诞辰115周年暨方东美哲学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华书局2014年,第222—257页。

^③ 参看方东美:《黑格尔哲学之前难题与历史背景》,收入《生生之德:哲学论文集》,第164页,引弗莱德里西·尼采《超善恶》,第211节。

然识力纵够,若不济之以愿弘,持之以恒毅,则嘎嘎空谈,何抵大成?故区区认为,闻中之所以能够超龄步上生命学问坦途,不仅凭借其学识双彰,才德并美,而更发乎其愿力宏深。三四年前,我尝评及其卓文《原人四足与玄之又玄》,已肯定其识力不凡,能详人之所略,从僻处创新,更从四点综观着眼,曰:(一)大题小做——难;(二)僻处创新——高;(三)西方异类——寡;(四)华梵解脱——超。结论曰:“衷心祝愿作者在其真诚热爱的印度梵学领域中递创硕果,成为继徐梵澄先生之后华人梵学研究之第二座丰碑。毕竟,这块园地是太缺乏、太需要像作者朱文信先生这样的拓荒者与园丁的献身了。”今日看来,虽大体无误,但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忽略了其强探力索背后的最大动机主因——愿力,难称“了义”。今借此补正。

例如,最能代表方先生圆成的思想体系架构的,不是哲学三慧型态,而是哲学四慧型态——含中国、印度、希腊、近欧等人类四大文化与智慧类型,如《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比较生命哲学导论》之《纲要》所示。黄振华教授根据其四年听课笔记,整理为《人生哲学讲义》。在方先生心目中位居世界四大文化与智慧类型之一的印度传统,在“方东美哲学思想研讨会”上怎能缺席呢?幸亏有闻中的挺身而出,才弥补斯憾。

诚然,历史事实不容否认,佛教在印度思想中毕竟只属于一小部分,更非主流。东西文明,比观对照,大别之,含中、西、印三大主流。方先生更将西方析为古希腊与近欧二型,创人类“文化四型”对应“哲学四慧”之说:希腊文化属契理型,显如实慧;近欧文化属业力型,显方便慧;中国文化属妙性型,显平等慧;印度文化属解脱型,显功德慧。而兹四大文化传统又各含三系:如希腊文化含奥平林、阿波罗、狄俄尼索斯三支,而以阿波罗精神为代表;近欧文化含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三支,而以三者兼具的《浮士德》精神为总代表;中国文化含儒、道、墨三支,而以儒家精神为代表;印度文化含佛教、奥义书、耶那三支,而以《奥义书》精神为代表。尤值得注意者,方先生系以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兼杰出的华严佛学者的身份与立场而作此表述,其公平性、开明性、客观性,不同泛泛,经得起严格的学术检验。

五、见贤思齐

若问何以过去两千多年,来华弘法的佛教大师居多,梵教大师盖寡?对此现象,也许我们可借前辈学人马一浮先生的一句妙语,姑进一解。据说北大校长蔡

元培亲函邀他出山,被他一句“古云来学,未闻往教”,而婉却、坚拒、顶回去了。因为民初孙中山委任蔡当全国教育总长,他担任秘书,共事半载,朝夕相处,深知蔡这位翰林革命党对“孔子”及“传统”的真实态度(如“废除祭孔”、“停止读经”等)。彼此既道不同,不相为谋,故特引华夏上古学风为辞,委婉讽诫。但无论如何,此语用来代表古印度情形,倒甚贴近、如法。印度宗教信仰神圣庄严,尤其对婆罗门阶级而言,教权地位还远在政治王权之上。外邦学者来学,自是乐施教化;要他派人远涉波涛,赴国外、境外“往教”?则未之前闻。但此说只能部分解惑,究竟因何,仍是一桩待决“公案”,只好留给今后致力中印文化交流的学者深入会参了。

不过,一桩可喜的文化现象逐渐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之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印度独立之后,梵教文化主动积极地走向世界,乃是不争的事实。例如,英国伦敦有“吠坛陀研究所”(the Vedanta Institute in London),美国俄亥俄州牛津市迈阿密大学设立了“国际吠坛陀总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Vedanta),创会会长拉玛·巴布博士(Dr. Rama Rao Pappu)是我南伊大前期学长。同时,1990年在该会举办商羯罗诞辰一千二百周年纪念会上,我有幸从雅竺(P.T. Raju)教授处获悉:今天致力向西方弘扬印度哲学精义的印度学者们,早已超越其前辈学人——从室利·阿罗频多到拉达克里舒兰等——的通论阶段,而迈入发挥《印度思想之深层结构》的新境地了。一如德国价值哲学名家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之于希腊以及近欧哲学传统之深入处理。惭愧,我们在系统了解印度文明大系方面,还只是处于试图起步的初阶!

再看看欧美从19世纪以来许多第一流的学者、诗人、哲学家和思想家对印度学大梵教认识之后的由衷推崇和礼赞,足资我们中国人当前一代参考,激发我们见贤思齐的高志大愿:^①

① 兹引四位欧洲的梵学先驱:(1)叔本华,德国19世纪著名哲学家,思想内涵以柏拉图、康德、欧洲浪漫主义及印度梵学为其主要成素,影响深远,下开尼采超人(超越)哲学、华格纳歌剧以及弗洛伊德人类深层心理学等。(2)艾略特,受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专修梵文及印度学三年;并从罗素习分析哲学,然却性好英国新黑格尔派大师布莱德雷之客观唯心主义;以布为题,完成博士论文后,短期任教哲学,旋即弃去,回归英国,任银行职员;致力写诗,终成20世纪英诗泰斗。(3)史怀哲,德籍,原为音乐家;三十岁始入柏林大学,从头习医,远赴非洲,行医救世,誓愿为白种人赎罪。著有《歌德五讲》《印度思想及其发展》等。(4)缪勒,19世纪末德国杰出语言学家,译有康德《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评》,编辑《东方圣典》丛书,由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亲撰书评;晚年讲学英国牛津,为梵学研究先驱,入英籍。

读《奥义书》是我生之慰藉,也将是我死之慰藉!……它是人类智慧的巅峰。——阿瑟·叔本华^①

印度哲人之玄妙精微使大多数欧洲的大哲学家看起来都跟小学生一般。——T.S.艾略特^②

我相信,假如我们、我们西方人,对印度思想的发展历程,都能原原本本洞察透彻的话,我们对印度思想的真谛,以及其对全人类思想的意义,就只有理当正确领会的份儿了。——阿尔伯特·史怀哲^③

如果有人问我在什么样的天空下,人的心灵……对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做过最深刻的思考,而且已经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找到了解答,是值得被那些甚至研究过柏拉图和康德的人注目的——我就会指向印度。假如我再问自己,对我们这些几乎完全受希腊人、罗马人以及闪族之一的犹太人的思想所教养的人来说,什么文献最有匡正的效果,而最需要让它使我们内心生命更完美、更全面、更普遍,事实上也是更人性化的一种生命……我会再度指向印度。——麦克斯·缪勒^④

我们扪心自问,远的不说,只问近代跨越 19 与 20 世纪这整整两百年的历史。其间中国不乏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学者、诗人、哲学家、思想家等。可我们从这些衮衮诸公的口中或笔下,几曾得闻类似的自觉法音?这方面的无知无闻,就是本书存在的最佳理由!

且看身跨 19 与 20 世纪的中国禅宗虚云大师:他一生志宏愿伟,悲智双运,

① 参看拉达克里舒兰:《东方宗教与西方思想》,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0 年,第 248 页。

② 参看 T.S.艾略特:《追随陌生诸神:近代异端手册》,法伯出版公司 1933 年,第 40 页,引自杰夫瑞·M·波尔与安德鲁·P·塔克合:《传统之暗利:论 T.S.艾略特印度学研究之意义》,《东西哲学》季刊,第 35 卷第 2 期,1985 年 4 月,第 125 页。It is perhaps for this [soteriological] reason that T. S. Eliot was led to speak of the Indian philosophers so highly: "Their subtleties make most of the great European philosophers look like schoolboys." Cf. T. S. Eliot, *After Strange Gods: A premier of Modern Heresy* (London: Faber, 1933), p.40, cited in Jeffrey M. Perl and Andrew P. Tuck, "The Hidden Advantage of Tradi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S. Eliot's Indic Studies," *Philosophy East & West*, April, 1985, Vol.35, No.2, p.125.

③ 参看阿尔伯特·史怀哲:《印度思想及其发展》,灯塔出版社 1960 年,查理·罗素夫人英译,第 5 页。

④ 缪勒:《印度能教给我们什么?》,剑桥大学出版社 1888 年;冯克与瓦尼雅里斯出版公司 1999 年,第 24 页。此段文字引自刘安云女士译本。

重建道场无数,例如:中兴宾川祝圣、昆明云栖、鼓山涌泉、韶关南华、曲江云门、永修真如等六大千年古刹。可他往往不等大功告成,就洒然离去。人问其故,但答:“留些功德给别人做!”我愿以这句智慧隽语,转赠本书著者闻中先生。成就《印度文明大系》中译、全面促进华梵中印两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精神融会,是件何等的大事因缘?岂一人一代之功?“但开风气足为师,功德留些后贤做!”

末了,请借朱光潜先生《谈美》的结语,为本书的读者群献上诚挚的祝福:

慢慢走,欣赏啊!^①

孙智燊

国际东美学社社长

《广大和谐》系列总编

2018 元旦于美国阿拉巴马州

莫比尔(杜鹃城)橡林居

^① 参看朱光潜:《谈美》,台湾开明书局 1967 年,第 135 页。

自序

当今世界,思想与哲学领域的地方主义式偏狭是危险的。查尔斯·穆尔(Charles A. Moore)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曾指出,哲学只有成为全球性的,并且在理论与实践上具有广泛性、综合性,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缔造崭新而美好的世界。长期以来,在永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与变易哲学(Changing Philosophy)的智慧寻找中,尤其在面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强烈冲撞与大量的哲学思想材料以程度不一的异质形态涌现时,敏感的哲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建立一种更宏阔的哲学视野之必要。

换言之,今日哲学之研究必须针对整个存在界,针对全部的时间与空间,其思想的经验应当包括全人类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精神成果和文明见解。显然,首当其冲,且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哲学遗产便分属于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与印度文明。中西印三种生命智慧,恰似三足,鼎立于天壤之间。然肇端不一,秉性各异。印度文明起自森林圣者的冥想;西方文明起自城邦的角逐与海滨的捕猎;中国文明则起自农耕劳作,与绵邈无尽的土地发生了古老而亲和的关系。于是,印度便多神秘的超越,西方多外在的进取与征伐,而中国呢,则多了一份现世的安稳与时日的风光。凡此种种,皆意味着“哲学比较”之重要价值。

故人处斯世,普遍性对我们的律令就会逼迫我们去思索德国东方学者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对于宗教学的理解,并将它转换为对哲学的理解:只懂一种哲学,其实什么哲学都不懂。东西方哲学精神的比较,所存有的诸多差异,因是西人发端,学界关注已久,研究者甚夥,成就可谓不菲也。然而,同为古老文明之代表的中国与印度,其间之异同相勘,却常为学界所忽视、所冷落。怪哉!

且另有一义我们尚需明确,即我们通常不忍回顾近现代以来的华夏之文化劫难,其沉痛、惨怛兼奇诡,被时人称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故为救此疲敝,援引他典,百多年来佼佼雄出者亦不少,其中,从西哲有之,从佛典有之,从耶教亦有之。而由“自古以来、貽我大祥”的印度寻求自我的文化疗救,则寥若晨星。独可赞者,惟以才具闳辟、天秉奇出,沉潜印土几十载的徐梵澄先生为最,其融通中西印圣典所酿就的哲学慧见灵光孤耀,惜乎此后几成绝响,吾人或无心回应,

或无力回应,其结果则一。徐梵澄先生云:“若使大时代降临,人莫我知,无憾也,而我不可以不知人,则广挹世界文教之菁英,集其大成,以陶淑当世而启迪后人,因有望于我中华之士矣。”

所以,我们今日此项关乎梵学与道学的工作之开展,亦势必要求研习者具备比较的眼光与阔深的视野,遍登哲学之群峰,望尽哲学之烟岚,最好还兼有阐幽辨微的中印古典之文献功夫,惟此,方能标出其至大的启示性价值,俾或贡献吾文化之新生,辅弼吾俗世之福祉也。惜乎此等大器之英才者久未现身,偶尔发见,脚踪渺渺,或是孤力冥索,全乏友军;或属野鹤闲云,高驾蹈虚。愚生也晚,再加智浅才拙,原何敢芹献于学界,奏曝于高士。岂奈倾心于印土吠檀多之胜义与瑜伽功夫学日久,常不免情动于衷;又逢着诸多宿缘,亏欠古圣之恩义尤其深重,非轻易容车以载之、斗以量之打发,实是恩重如山、一弹三叹矣。故秉笔壮胆,草就此书,无非衔环结草,一竭愚诚耳。且发吾之微响,申吾之微志,未必便无投石问路之效用,或引出真豪杰者亦未定。此所谓高山流水,嗟尔有待;知其音者,盍兴乎来!

合此论著,其大体内容便是试图会通中印文明的核心精神,即道学与梵学。简其言,或云中华学问是谓“道”学,其精神在“和谐”,在“和合”,印度学问是谓“梵”学,其精神在“尽性”(Sadhana),在“联结”(Yoga),常因行于无尽而微明的遥途,故二者又皆属“广大悉备”的人间境界学,是生命自身的至高学问,盖皆求证乎亲验亲历耳。彼西方哲学指穷处,二者正可以从容而自在地起步矣。

全书分二十章,涉及古奥义书、梵经与《薄伽梵歌》诸经,同时涉入中国的易经、尚书与老庄等古典道学要旨。亦佐以不少中华古学里练形修性的学问,与彼印土之瑜伽秘义可相互摩荡,而兼相参焉。另,再加入一部精短的印度不二论典籍《婆希史多瑜伽精义》之译文,此孤峰迥出、睥睨群雄之圣典也,俾附骥尾,或壮声色,或助士林。

愚私下常臆度之,东方学术之慧命原本就建基于性命之本源,故关乎内在的安乐、直下的欢喜与原原本本之幸福,这一切的获得,自然起于身心之修炼,与性命之通达。相信印度学问对于中国与对于世界乃属一样的重要,而对国人的性命与身心之学更当有无尽之助益与启迪。惟可惜者,我们近现代以来的西化教育单边独大,迄至今日,失落了此中多少妙义,多少上好的精神窜失于民间杂学,而致淹没于无踪。惟愿此种比较,借拙著出版与问世之机,与有识之士,同诸共

好,齐证并揭出此中生命之实学、生命之实理。

曩日,受持《大方广佛华严经》,诵读至“光明觉品”等,其中描述了东方世界的种种光明、种种妙相妙音声时,心中大为震动,我们今日剑指此间烟岚之迷离,谈论峰巅之胜境,何曾不是一种对“东方精神”的期待与祝福。

其文云:

尔时,光明过此世界,遍照东方十佛国土,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又云:

一时,诸色相海,无边显现;摩尼为幢,常放光明,恒出妙音,众宝罗网,妙香华缨,周匝垂布;摩尼宝王,变现自在,雨无尽宝及众妙华分散于地;宝树行列,枝叶光茂。

而那位深爱我们东方文明的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在其惆怅迷离的《东方之旅》中的一段话正可以供给我们,俾作如是总结。云:

东方的远征,不仅仅是属于我的和现在的;这个由信徒和门徒所构成的行列,一直都在不断地走向东方,走向光明之乡……我们的目标不只是东方,或者不如说东方不仅是一块国土和地理上的东西,而且也是灵魂的家乡和青春,它是处处皆在而处处不在,它是一切时间的联合。